

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蒋相泽

自选集

JIANG XIANG ZE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蒋相泽 | 自选集

JIANG XIANG ZE ZI XUAN JI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东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相泽自选集/蒋相泽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6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岭南社科名家文丛)
ISBN 978-7-218-05389-9

I. 蒋… II. 蒋… III. 国际关系—文集 IV. D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2349 号

责任编辑	柏 峰
封面设计	张力平 吴德灏
版式设计	虹 峰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268 千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8-05389-9
定 价	52.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37579695】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任：林 雄

副主任：蒋 斌 陈俊年 黄尚立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桂科 朱仲南 刘 蔚 李子彪

李夏铭 张小杰 杨以凯 陈海烈

林海华 金炳亮 曾少华 颜泽贤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评审委员会

主任：颜泽贤

副主任：梁桂全 蒋述卓 李 萍 王国健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兴 王利文 田 丰 叶汝贤

刘少波 张小杰 李恒瑞 李新家

陈长琦 陈海烈 陈鸿宇 苏立功

肖海明 陆家骝 罗必良 金炳亮

唐钰明 黄尚立 扈中平 蔡 禾

廖小健



蒋相泽 (1916—2006)

贵州省安龙县人。先后在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成都金陵大学、昆明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学习。1951年3月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1951年4月起，任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副教授。1978年9月起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并于198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世界史特别是国际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国际关系史、西方史学史、中美关系史领域研究成果卓著，著有《捻军起义》、《美国与中国》（以上两本以英文出版于美国），《国际关系与西方史学论集》；主编有《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简明国际关系史》、《简明中美关系史》、十卷本《国际关系史》（主编之一、第五卷常务主编）；译有《使日十年》。（作者近照由吴德灏拍摄）

出版说明

2004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省委、省政府贯彻中央精神，随后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决定》。这两份文件极大鼓舞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启了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作为贯彻落实两份文件精神的一项重大举措，2005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在广州召开的全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工作会议上，隆重颁布奖励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和2004年度国家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以省政府的名义奖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广东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次评奖中专门设置了一项“特别学术成就奖”，18位年逾七旬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获此殊荣，他们是：张磊、曾牧野、张江明、王琢、梁钊、夏书章、陈锡祺、蒋相泽、吴宏聪、端木正、李锦全、高齐云、黄天骥、黄德鸿、赵元浩、曾近义、汤在新、桂诗春。这些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成果卓著，在各自专业领域成为学科带头人、领军人物，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得到这样的荣誉，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就在这次会后不久，省委宣传部主持召开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编选

18位专家的自选集，由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全额资助出版。这就是《岭南社科名家文丛》的由来。这些专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要以一本书的篇幅，展现其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成就，并不容易。很多专家在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一些专家同时撰写多种体裁的文章，有的还发表过外文论著。因此，我们与专家们达成共识，遵循以下原则编选：（一）每本书的篇幅约25万字，一方面体现精选精编的精神，一方面也使读者买得起。（二）只收论文和少量演讲稿、调查报告，不收中外文专著。（三）只选本人最有专长、最具影响的专业文章，不收其他领域的著述。（四）为保持本原特色、历史轨迹，所有文章原则上不作修改，但注明发表时间和原载报刊。（五）为方便读者阅读，对入选文章进行分篇类辑。（六）每人以第一人称撰写一篇学术自传，以展现其求学历程，总结其治学经验。

18位专家大多年岁已高，有的行动不便，有的卧病在床，但他们都对编选工作极为认真，大部分专家亲自动手编选文集和撰写学术自传，有的专家与出版社的编辑反复商量斟酌，其认真态度、严谨作风，令人敬佩！为了抢时间，赶速度，我们尽量抓紧编选和编辑出版工作，还在第一时间为18位专家拍摄了肖像照片，但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高齐云、蒋相泽、端木正三位先生驾鹤西去，没能等到书的出版，我们留下的影像竟成为最后的资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原定18种书整套一次性出版，现改为分期分批推出，完成一批推出一批。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成立于1997年，是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具体运作的一个评审、资助社科著作出版的机构，每一到两年评审一次，每次评出省内专家学者撰写的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十余种。基金成立以来共评审和资助出版著作百余种，其中30多种图书荣获省部级以上各种奖励。这次集中资助出版省政府表彰奖励的18位著名专家的个人自选集，可以说是基金资助出版的一次创新。

丛书以“岭南”冠名亦有寓意所在。因为“岭南”已不仅仅是地域的概念，而且具有文化的意蕴。在当前形势下，岭南文化为我们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和谐广东，必将注入新的活力。为此，我们组织出版“岭南系列”，包括《岭南博士文丛》、《岭南社科名家文丛》、《岭南文化大讲坛系列》等等，力求打造成为文化大省建设中的一个文化品牌，希望得到社科界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参与。

广东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
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
2007年3月5日

学术自传：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一点体会

我于1937年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1940年，进昆明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初步进行历史研究活动。1947年赴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攻读博士学位。1951年毕业回国，先后在岭南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并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我从事历史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已近七十载。这里，我愿意谈谈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心得体会，与青年朋友共享。

我大学一开始读的并非历史。1935年9月，我进入杭州之江大学文理学院读英文与外国文学。由于对文学不感兴趣，于是1937年初，我转学到南京金陵大学，改学历史。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其地位虽不比北大、清华，但它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个学期有三次月考，一次期考，一个学期要考四次。老师对学生读书要求也很严，一般都要求学生研读指定参考书，写出读书报告，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实际上，写读书报告就是一种初步的研究活动。因此，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做研究必须有自己的，哪怕是错误的心得体会，必须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自己的创见。

这是我在大学三年级就体会到的。

但读书报告终究与真正的历史研究还是不同。我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还是在清华研究院做研究生期间起步的。大学期间主要是打基础，看看书，写写读书报告。但研究生却是要真正地做研究。在清华期间，吴晗先生建议我做清朝前期的内阁制度研究。清入关前，它搞的是八旗制度，初步设立了内阁。入主中原后，逐步采行了明朝式的专制体制，搞内阁制。那么，这个演变的情况是个什么样子呢？于是，我开始看书。看《清实录》，看《东华录》，看《清史稿》。总之就是看书。在看书的过程中，随着认识的深入，纸上就自然地浮出一根线。这根线就是八旗制是怎么转到内阁制的，从内阁制又怎么转到军机处的。这根线不是我自己找的，是看书看多了之后它自己浮现出来的。我就按这条线来写。写了一半的时候，我就交给吴晗先生，请他提意见。他说，你可以继续写。这就是因为我找到这条线了。清朝是如何从八旗制度转到汉人的那个专制制度的呢？它就是借助内阁制，用内阁逐步削弱旗主的权力。特别是雍正，他不遗余力地打击旗主。他觉得内阁都不过瘾，他要搞军机处，让极少数的人参与军国大事，其他人不管。八旗还在，旗主也在。但不是搞“联旗制”。旗主只是一个大臣，他就做了明朝式的皇帝了。加之，因为清朝是异族来统治汉族，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他靠什么来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呢？他就靠内阁制。逐步采行了明朝式的专制制度。我把这条线找到了，所以文章也就好做了。于是，我以《清朝前期内阁制之演进与政治》为题，写出了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老师评价

说，文章主题明确，有一条“Thesis”。这样我就有了第二个体会，就是做研究必须要有一条主线。换句话说，必须有一个“Theme”，或者是“Thesis”，必须有一个主题。

清华毕业不久，我考取了美国留学，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继续学习、研究历史。我认识到研究历史光有一条线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面的概念。这是我在研究“1939至1941年纳粹德国的对美政策”时发现的。这时，德国纽伦堡战犯法庭审判的资料已经印出来了。我当时参加一个Seminar，也就是讨论课，老师指定学生要写小论文。我就看了纽伦堡审问德国战犯的材料，写了《1939至1941年纳粹德国的对美政策》的论文。在写的过程中，我就有了第三个体会，就是研究国际问题不能单纯靠哪条线，还应该注意面。具体来说，德国的对美政策，一是牵涉到它跟日本的关系。开战之初，德国锁定英国为主要敌人，故极力避免刺激美国。尽力对美国忍让，同时利用日本，叫日本去对付美国，使美国把它的主力转到对付日本。二是牵涉到它与苏联的关系。苏联当时没有参战。苏联在德国的后面。希特勒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叫日本去对付美国，把美国的主力引到太平洋。一个是打苏联，把苏联打垮了，美国主力也引开了，它就能收拾英国了。由此看来，一根线是不够的，还要有面上的东西。你要搞清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和英国的关系，和苏联的关系，还要搞清它跟美国的关系。题目虽是《1939至1941年纳粹德国的对美政策》，但它并不是限于一个美国，它牵涉到日本，牵涉到英国，牵涉到苏联。所以，我的第三个体会就是只有一根

线不行，还要注意面，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啊，你光有一根线，那怎么行呢？德国对美政策当中包括怎样对付日本，怎样对付苏联，怎样对付英国。所以呢，不是一根线的问题，还有一个面的问题。这是第三个体会。

我的第四个体会不算是学术上的，但我自己觉得很重要，那就是留学生学成之后应该回国服务。今天的留学生，不少人留恋国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选择留在了国外。我们那个年代，大多数学子心系祖国，不畏艰难，最终回到祖国服务。我个人也经历了这个情况。当时虽然身在海外，但却非常关注国内局势的发展，对刚成立的新中国充满了向往之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时，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聘我做研究人员，月薪300美元。不久，我的博士论文也写完了，1951年3月通过了答辩。当时，由于朝鲜战争，中美已成为敌人。我的想法就是，我不能呆在美国，我必须回国，我不能为远东学院服务，我毕竟有一颗中国心。当时，美国人不准留学生回国。申请离境者，可能要罚1000美元，或者坐1年的牢，或者两样都有。所以，很多人不敢申请的。当时美国有一项规定，广东人、广西人、福建人，这三省的人，可以回去。这三省的华侨最多。我是贵州人，于是就给广东省文教厅写信，要求帮助。于是广东省文教厅就出具一份证明，证明我是广东人。这样我就可以买船票，就可以申请离境。就这样回了国。那时候回国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船一船的，一船总得有十几个吧。到了香港，由港英警察押送出境。罗湖桥这边则由留学生招待委员会的人欢迎我们。我们这些人不畏艰难，选择回国，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国有我们

的亲人，我们应该回去；中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应该为她服务。当然，今天的留学环境以及中美关系和那时很不一样，但留学生为国服务的情怀我想是不应该改变的。

简单地说一下我的工作经历。1951年回国后，我到岭南大学任教。次年，院系调整，我到中山大学任教，一直到1998年退休。在岭南大学，我教世界史课程。在中山大学，我教过的课程也不少。系里的领导说，你从外国回来，所以要教世界史。这是什么逻辑，我不知道。但我服从安排。这样我就给1952年院系调整后招进来的新生上世界上古史，主要采用的是美国资料。教了一年，领导说，你教得不好，得改教中古史。上古史教得不好，所以改教中古史，这是什么逻辑呢？也不知道。但1952级新生此时变成二年级，需要有人上中古史，我是知道的。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我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些材料是不能用了。1953年夏天，学校办了一个俄文突击班，我学了20天的俄文。随后，借助字典看苏联人写的世界史教材。中古史、上古史我本来就有基础，此次采用俄文教材，学校居然说我教得好。学校的副教务长还特别对我加以表扬。到了1958年，系里又让我教近代史。我又把苏联教材拿来，利用寒假，借助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懂。为什么要利用寒假呢？因为1958年秋天开学后，我们到东莞劳动。系里通知让我下学期教近代史。1959年1月份回来后已是寒假。所以只能利用寒假备课。在东莞劳动的时候，学生用土改的办法搞教学改革，把我拉出来批斗。我回来教近代史，学生恰恰是跟我一起劳动的那一批。我的课不仅没有受到

学生的批斗，反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到了1961年，系里说，近代史不要你教了，应该由年轻教师来教。你要教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名著选读。于是我又教西方史学史，一直教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文化大革命”给我的头衔不断修改。先叫“牛鬼蛇神”，后来叫文化特务，后来改叫斗批对象。我与很多人一样，下干校劳动。到1971年，上面通知已经回到学校的我，要到省委去讲世界史。于是我又跑到省委去讲课，讲课受到欢迎。这下声名远播。广州军区请我去讲，东山区政府也要我去讲。1972年学校开始招生，系里要我给工农兵讲经典著作的时代背景，讲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讲《法兰西内战》，讲巴黎公社的时代背景，受到工农兵学员的欢迎。不久我又被要求讲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到1978年，系里又通知我带研究生。于是我开始招收国际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1981年和1984年，我两次应邀赴美国讲学，在讲学之余写成《美国与中国》一书。总而言之，我是历史系的“119”，救火的。哪里有火，就叫我去救。1986年，系里又通知我招博士生。于是我又开始招收中美关系史方向的博士生，直到1998年退休。1980年，我的老师王绳祖要我筹办国际关系史研究会。于是在广州开成立大会，我被选为副理事长，王绳祖为理事长。1993年，我又担任了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的副会长。

回国后，教书成了我的正式职业，因而有了第五个体会，就是教学当中必须同时做科学研究。因为很多问题不做研究是弄不清楚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巴勒斯坦问题、中东问题，学生老是来问。美国和以色列为何能

把那么多阿拉伯国家欺负成那个样子。我不做研究怎么能回答！所以，教学与科学研究必须同时进行。此其一。其二，你每年都是用那个讲稿，像留声机唱片一样，每年拿去放一次，这不行吧。你这个讲稿得修改嘛，得深入嘛，得提高嘛。用什么方法去深入、提高呢？只有用科学研究！可见，教学不仅要用科学研究来提高，而且，教学与科学研究不可分。

第六个体会，教学也好，科学研究也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它都有一个指导思想。有一个西方学者说，“我没有发表意见，我只是把史料摆出来，我让史料说话，让事实说话，我自己不过是一个传声筒，如此而已”。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史料，那么多东西，你叫它说话，叫历史本身说话，而史籍却汗牛充栋，那你怎么叫人家去看呢？你拿什么历史事实去说明问题、说明历史呢？他回答说，我当然要选择。那么你怎样选呢？他答到，当然选那些我认为是关键的、重要的东西了。你凭什么认为哪些是重要的、关键的呢？当然是根据我的观点了。所以，不管你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你都必然有一个指导思想。比如，研究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你看了很多关于罗斯福的资料与书，当然不能让那些书自己去说话。你不可能把所有关于他的资料 and 书都抄在你的文稿里啊。你一定会选择那些重要的、关键的东西写在你的文稿里嘛。选什么呢？那当然就得根据你的观点了。罗斯福的书看多了，他的对华政策就会浮现在你面前。这就说明你已经抓住了主题。而解释这个主题，就必须有你的指导思想。教学也好，研究也好，你都自觉或不自觉有一个指导思想。我回国

以后，学习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并尽量地学习用马克思主义来做指导思想。这样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马、恩的很多论断都是一针见血，令人叹服。马、恩全集里有很多是讲历史的。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我就根据恩格斯的两段话加以诠释。一段话说法国革命有三个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到雅各宾专政时达到顶点。我就学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恩格斯的话确实把法国革命说清楚了。那就是，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比较彻底的一次。那它最后为什么又失败了呢？恩格斯还有另外一段话。他说，雅各宾到后来做了当时条件下还不允许做的事情，它超越了历史实际。它所采取的很多措施是极端的、勉强的、超前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靠断头机来维持，最后它必然走向失败。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不能超前的指导思想，到今天还有现实意义。有了恩格斯这两个指导思想，我就把法国大革命讲清楚了。所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不仅要有一个指导思想，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我自己教书、研究体会出来的，不是首长做报告告诉我的。

以上我结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谈了几点体会，都是自己的真情实感，说出来也许对青年朋友有些启发。至于我发表的那些著作，我想，有兴趣的读者自可阅读、评判，这里就不涉及了。

目 录

学术自传：我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一点 体会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巴黎和会期间的 中美关系	1
中国和华盛顿会议	24
纳粹德国重整军备	44
纳粹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	72
三十年代欧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	91
希特勒进攻英法的决策与张伯伦的 对策	114
美国走向参战（1939—1941）	147
英美苏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 （1941—1942）	175
美国的援华抗日	191
纳粹德国为何对美国宣战	207